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16CB-08)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出 航

——玛丽·麦卡锡的女性成长小说研究

李贺青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序 言

这是一本关于女性成长的书。与任何著作一样，不管作者是否承认，它必然蕴含着作者先验的假设、前提和偏见。必须承认，本书深受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本书对玛丽·麦卡锡小说主题的解读，以及对于女性成长的价值判断，都浸润着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它们包含，但不局限于，以下的一些认识。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在这里，“女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的是内化了社会价值观，置身于社会现实中的女性。“男人”的概念与此对应。作者相信，男人与女人，同属于一个物种，并没有不同的本质。尽管女人承担了月经、妊娠、哺乳等物种繁衍的负担，有着与男人不同的性别体验，但男人和女人有着共通的欲望、追求、情感、幸福和痛苦等等。独特的性别经验的差异并不构成人性不同的本质。在《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克控诉说：“难道犹太人……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夏洛克的控诉，换作女人，同样适用。“男性特质”（masculinity）与“女性特质”（femininity）并不真正存在。然而，不可否认，在当今世界，男女之间，在性别经验之外，在心理、价值观、精神气质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社会赋予的，是一种社会性建构。

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与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都是社会价值观和男女的社会境地所决定的。自从其出生之日起，社会对于男人和女人就怀有不同的期待，提出不同的要求，灌输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男人，他应该勇敢、坚强、果敢、正直无私、积极主动，胸怀家国使命，走出家门，走向广阔的未知的天地，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对于女人，她应该软弱、顺从、被动、天真、纯洁，听从命运的安排，耐心等待一个好男人爱上自己，成就美满姻缘，成为一个快乐的妻子、慈祥的母亲、乐天知命的主妇。如果她也有一份工作，那不过是为了补贴家用，可有可无。她应该满足于现状，并随时准备为了家庭和丈夫牺牲自己的职业。在人与自然的战斗中，她永远站在二线，帮助、期待丈夫、孩子取得成功。这里，未知世界代表的超越性与男人的性别使命和谐地融为一体。而对

于女人，她的性别使命把她封闭在婚姻和家庭之中，自主性成了自在性，超越性成了内在性和偶然性。正如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所指出的，人们常常把坚韧、进取、好奇、志向、计划、责任、创新、竞争、自信等品质与以“工具性”（instrumental）为特征的男性角色相联系，而把顺从、活泼、亲切、嫉妒、挑剔、易怒、报复、做作等品质与以“表达性”（expressive）为特征的女性角色相联系。如果这些描述含有部分真实的话，那是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社会境遇造成的。萧伯纳曾经开玩笑说：“美国白种人把黑人降低到擦皮鞋的一类人中，并由此得出结论，黑人只能擦皮鞋。”与此相似，男权社会向女性灌输顺从、被动、宿命论的价值观，把她们封闭在妻子、母亲、主妇的性别角色中，把她们降低到了从属的性别，并由此得出结论：那是她们的本质，是她们命中注定的角色。

解读一部文学作品，不做出价值判断是很难的。对于成长小说的阐释尤其如此。追求幸福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幸福呢？是一位纺织女工幸福，还是一位女科学家幸福？是一位家庭主妇幸福，还是一位职业女性幸福？是偏僻山区的村姑幸福，还是大都市的职员幸福？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一个主体如何知道另一个主体是否幸福呢？如何知道自己并非主观臆测呢？两个主体的幸福是否具有可比性呢？如果一个主体把自己理解的幸福强加于另一个主体，那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和奴役呢？

本书作者认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观点：“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行动或事业，作为他超越自我的方式，具体地确立自己的。他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除非朝着无限广阔的未来扩张，没有其为当前的存在辩解的理由……每一位努力实现其生存意义的个体都感觉到他的生存涉及这种需要：超越自我，从事自由选择的事业。”

本书作者相信，幸福来自于主体的自由。自由，是人生幸福的标准和基本量度。一个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在于他的自由意志。主体通过他的事业，实现他的自由意志，超越了他的内在性，走向未知的广阔的世界。他的工作和事业是他的超越性的载体，也是他的自由、他所追求的生存的意义。作者深信，女人，和男人一样，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工作与事业追求——那是她的主体性得以实现的唯一渠道，也是她参与社会、实现个人解放的唯一渠道。通过事业追求，她不断地从一个自由走向另一个自由，朝向未知的无限的世界发展，也将最终实现自由。在不断的追求中，她实现了自我超越，从自在走向自为，实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要求。她也因此主宰着自己的命运，摆脱了她的宿命，

拒绝了男权社会的奴役。“走过不同的地方，看遍不同的风景，了解不同的世事，感悟不同的人生”正是这种人生历程的诗意表达。

在麦卡锡的女性成长小说中，几位女孩相继选择回归家庭，选择了更加容易的人生道路。于此，作者深感同情与怜悯，也为她们的人生感到惋惜。回归妻子、母亲的性别角色，并以之为人生唯一归宿，那些女孩回归到了一种非人性的生活，存在成了自在，自由成了束缚与偶然。她们失去了超越自我、追求自我潜能的可能性，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可能性。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其标志是人类，作为主体，相对于客体——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家用电器减轻了家务劳动，避孕技术使女性可以控制她们自己的身体，女性解放运动极大地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但这绝不意味着社会的发展是直线上升的，或一个时代必然比前一个时代更为进步，或者一个时代的人们必然比前一个时代的人们更为高尚。事实上，世纪之交的新女性，远远比她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更令人尊敬。一般说来，这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在一个追求自由、人的主体性充分发展的时代，那一代人往往更令人尊敬。一个物质主义为时代精神的时代，必然比一个追求自由和个性发展的时代庸俗和卑下，一个蒙昧专制的时代也必然比一个自由启蒙的时代丑恶和低劣。但对于个人，作为主体的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他可以选择艰险的道路，也可以选择容易的道路；他可以追求理想，也可以甘于安逸；他可以选择自由，也可以选择凝滞。人的向善性（perfectibility）是成长小说的一个基本预设。人的成长，也是他不断追求自由，追求道德完美的上升的过程。

有人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成长小说里，爱情与婚姻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从历史上看，婚姻是两个家族的联合，与爱情无关。皇家的联姻，更是事关国与国之间的亲疏，战争与和平的肇始。中世纪骑士爱情的产生，也许是现代浪漫爱情之滥觞。但骑士与贵妇的精神之爱，又与婚姻无关。融合了性与爱的现代婚姻，是中世纪以后才产生的。在成长小说中，那些使我们快乐或痛苦的爱情故事，那些激荡我们心灵的悲欢际遇，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心绪？又如何影响甚至决定着男女主人公的人生幸福？简言之，什么才是理想的爱情和婚姻？

作者相信，理想的爱情至少有以下三点特征：之一，自由。当一个主体超越其内在性，朝着未知的世界扩张时，爱情给予他或她的是精神的激励，而不是专制、束缚和奴役。主体把伴侣视为与自己相同的本质，而非非本质的客体。

两个主体因而感到行动与精神的自由。主体超越其内在性而获得真实的自由，与爱情赋予的精神自由相得益彰。爱情也是主体超越性的一部分，是他或她走向自由的必经之路。之二，相互吸引。爱情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然放飞；相恋的男女为对方丰富的心灵所吸引而相互靠近，希望和对方分享人生；同时也对对方的身体产生欲望，希望灵魂与肉体的交融。理想的爱情没有勉强，没有抉择的痛苦，没有懊悔，也没有压迫。它是两颗快乐心灵的迅速靠近，是孤独人生的化解。之三，非功利性。爱情不应以提高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境况为目的。主体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自由选择的事业，不断超越自我，向着无限广阔的未来扩张，从而实现自我价值，主宰自己的命运，实现自由，享受成功和幸福。当他或她把改变自身境况的理想寄托于伴侣时，他或她就退出了超越自我的行动和事业，超越回落到内在、停滞，自由就成了束缚和偶然。放弃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也放弃了人的自主性，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失去了个人幸福的本源。

理想的婚姻是爱情的自然延伸，是水到渠成的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如果说爱情以心灵的交融为特征，以与对方同化为目的，那么，婚姻则是以性与责任为特征，以分享人生为目的。当爱情消失时，有很大可能，婚姻仍然会存续下去。D. H. 劳伦斯曾提出星辉相映式的爱情观。他认为，男女双方，都应该是平等、完整的存在，是完美的一极；男人确信其阳刚之气，女人则确信其因阴柔之美；性行为不是任何一方的吞并或投降，而是一方促成另一方的完美实现。“他们彼此间给予这种星体之间的平衡，唯有这种平衡才能称作自由……她对他的关系就是他对她的关系，这是神秘的、可触知的另一个主体自古以来就有的华美。”（《恋爱中的女人》）但在本书作者看来，男与女并无本质的规定性，男人的“阳刚之气”与女人的“阴柔之美”并不存在；它们都是社会赋予的幻象。尽管他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无处不在，但劳伦斯视男女为平等主体的观点值得肯定。关于理想的爱情与婚姻，本书作者更赞同舒婷的《致橡树》中描绘的恋人形象：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诗中，两位平等而坚强的主体，心心相印，共担风雨，共享人生。他们共同超越了主体自身的内在性，一起走向未知的广阔的世界。他们的人生蕴含着无尽的可能性。

在麦卡锡的女性成长小说中，理想的爱情并不存在。诚然，即使在 21 世纪的今天，理想的爱情和婚姻也不多见。但是，麦卡锡的女主人公们的人生经历读来仍然使人倍感心酸和压抑。她们或者把婚姻当成改变自己经济、社会境况的跳板，或者放弃了超越自我的机会，回归内在性，以别人的成功作为自己人生的目的，丧失了自由和主体性，或者陷入痛苦不堪、不可自拔的苦恋。

本书既是体裁研究，又是主题研究。体裁研究和主题研究之所以能够并行不悖，是因为成长小说是一个主题上的定义，而非形式主义定义，因而不可能脱离其主题去研究其抽象体裁。本书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玛丽·麦卡锡的三部女性成长小说的主题内涵，并探讨其体裁创新。

在《她所结交的朋友们》中，女主人公梅格，作为一个“新女性”，追寻自己的生活意义和个人身份。在成长小说的题材上，小说表现了空前的大胆和魄力，凸显了 20 世纪初女性自由的极大扩展和追求个人身份时的迷失。在《着了魔的人》中，麦卡锡基于自身的经历，提出了女性——特别是女艺术家——成长过程中的“导师焦虑”——女性与男性导师之间的难以跨越的纽结——这一问题。小说表现了女主人公追求独立自主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以及女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克服“导师焦虑”之艰辛。《少女群像》是一部女性群体成长小说，刻画了 20 世纪中叶一群追求个人身份的年轻女性，表现了女性追求社会身份之艰难。在“女性的神话”这一强大力量的威压之下，女性的生存空间被极大地压缩，被迫回到传统的为人妻、人母的角色。

在女性叙事上，麦卡锡跨出了一大步，为女性成长小说的发展开拓了新的

空间。她的女主人公在外部扩展、身份追寻、性的自由等方面已经与传统的男性主人公们相差不大,显示了在 20 世纪初叶女性空间的极大拓展和女性自由的增长。在个人身份追求上,麦卡锡的女主人公大多还局限于内省式的追寻,把自己的命运多舛归结于自身欲望和需要的扭曲和个人身份的迷失,而很少意识到个人身份存在于个人的社会角色中。这一点,表现了麦卡锡的局限性和她对女性内省传统的继承。在社会关系上,她的女主人公仍然深陷婚姻、家庭等感情纠葛中。婚姻和家庭仍然是她们追寻人生价值和个人身份的载体和归宿。这和当今的女性成长小说中女性追求个性独立,和男权社会彻底决裂,而拥抱女性社区和女性化的大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对女性独立、自由、身份的追求上,麦卡锡仍然是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但她的小说中也蕴含着她对女性情感和女性友谊的颂扬,预示了今天女性成长小说的这一趋势。麦卡锡的女性成长小说,植根于 20 世纪初期的新女性群体,表现她们的梦想、追求、焦虑、幻灭,在许多方面开创了女性成长小说的先河,为后来的女性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男性是主体,女性被定义为他者。无论男女,自其出生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处在社会的成见和传统的熏陶和灌输之中。它们早已深入个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男人,一个未经世事的男人;他的偏见和男性沙文主义也许时时从抽象的平等和对女性的同情中探出头来。普兰·德·拉巴尔曾指出:“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本书亦然。感性经验的缺失,是本书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读者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但感性经验,毋庸讳言,往往也是另一种未经检验的成见,本书作者幸免于此。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信鬼神,也不信上帝。在不长的人生岁月中,他经历过成功的欢乐,也经历过失败的痛苦。他曾从地狱走过,知道人生的艰辛,和欲望的虚妄。但他仍然信仰爱,信仰真诚,信仰美好。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真诚感谢曾经帮助过他的老师、朋友和亲人。他想说:感谢你们,我从地狱走过,并未因此沉沦,因为你们与我同在。我爱你们。

李贺青

2016 年 8 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女性成长小说的兴起	13
1.1 成长小说的男性传统	13
1.2 男性成长小说在美国的演变	16
1.3 女性成长小说的兴起	18
1.4 美国文学中的女性成长小说	19
第二章 追求女性身份——《她所结交的朋友们》	23
2.1 梅格对自我的追寻	25
2.2 麦卡锡的女性成长小说：僭取与新生	47
第三章 一位艺术家激烈的自我张扬——《着了魔的人》	55
3.1 雅典少女与牛头怪：麦卡锡的威尔逊情结	55
3.2 玛莎激烈的自我张扬	59
3.3 麦卡锡的女性成长小说：导师焦虑	68
第四章 家，甜蜜的家——《少女群像》	79
4.1 《少女群像》与“女性的神话”	80
4.2 出航：九位女孩的人生历程	90
4.3 入航：女性成长的失败	103
4.4 作为女性成长小说的《少女群像》	108
结 论	115
参考文献	121

导 言^①

I. 玛丽·麦卡锡简介：生平和作品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的近四分之一世纪里，玛丽·麦卡锡在美国文艺界像一座高山，这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也因为她是一位极为活跃的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中叶，如果要挑出一位美国女性知识分子的话，她的名字可能第一个跳入你的脑海。玛丽·麦卡锡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社会批评家、传记作家、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玛丽·麦卡锡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的生平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你也许从未读过她的作品，但你还是会听说她的故事——她的小说、绯闻、诉讼、悲惨的童年等等。正如她的传记作者卡罗尔·布莱特曼（Carol Brightman）所说：“玛丽·麦卡锡是少数生活即是传奇，如她的作品一样生动有趣的美国作家之一”（xiii）。她把麦卡锡比作海明威，一位生活和作品奇妙地融合在一起的作家。然而，海明威的探险之旅被千万人模仿，但麦卡锡的旅程却无人可以效仿。她追求赤裸真相的激情也使任何追随者望而却步。

玛丽·麦卡锡于 1912 年 6 月生于西雅图。父亲罗伊慈爱、浪漫、多才多艺，母亲特丽莎温柔而美丽。对于小麦卡锡来说，和父母在西雅图共度的孩提时光是纯粹的快乐。但在 1918 年，麦卡锡 6 岁时，震撼世界的瘟疫——西班牙流感——爆发了，父母决定搬迁到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在东进的列车上，她的父母都发病了，在列车到达后不久相继病逝了。四名孤儿被送给无子女的姨妈抚养。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暴虐的“迈耶斯叔叔”的粗暴对待。“我们时不时就会被揍上一顿，挨打已成家常便饭。”（*Memories*, 36）在姨妈家的这

① 本书书名《出航》的灵感来自伊丽莎白·亚伯（Elizabeth Abel）等编著的论文集《归航：女性成长小说》。在该书中，编著者指出：“女性成长小说……通常用内省替代积极的行动、反抗，或撤退。”（8）然而，在麦卡锡的成长小说里，女主人公却走上一条出航的路，她们用积极的行动、反抗、撤退替代了内省式的沉思。她们的出航意味着主动卷入男人独占的公共领域和女性空间的极大扩张。《出航》（1915）也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的同名女性成长小说。小说中，女主人公蕾切尔走出了倍感束缚的女性空间，扬帆远航，驶向了远方的海洋。

五年成了麦卡锡一生的噩梦，也使她的人生染上了忧郁而善感的色调。

1923年，麦卡锡被姥爷从凄惨的童年中拯救了出来。姥爷把她带回了她的出生之地——西雅图。西雅图的生活奢华而舒适，但又孤独而封闭。1929年，麦卡锡东去瓦萨学院上大学。瓦萨学院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女子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了雄心勃勃的演员哈罗德·约翰斯拉德。1933年，大学刚毕业，她就和哈罗德结了婚。然而，这场婚姻却并未带来幸福，很快以离婚告终。在1936—1937年，离婚后的麦卡锡开始了她一系列的性探险。她很快成了《党派评论》的创刊者之一的菲利普·拉夫的情人，进入了《党派评论》编委会，开始了她作为小说和戏剧评论员的生活。1937年10月，她在约稿时遇到了埃德蒙·威尔逊。出乎朋友们的意料，她很快离开了拉夫，在1938年2月10日和威尔逊结了婚。这场婚姻似乎是一场悲喜参半的悲喜剧。威尔逊引导她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地，但也带给她无尽的痛苦。麦卡锡曾说，如果他没有把她领到那间小书房，然后坚定地关上门，她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位小说家（*Intellectual Memoirs*, 100）。然而，作为丈夫，威尔逊执拗而专制，特别是在他醉酒之后。和威尔逊的七年婚姻（1938—1945）也是她成果丰硕的岁月。在1945年离婚之时，她已经成为了知名的批评家、远近闻名的作家了。后来，她又结了两次婚。只有最后的一次婚姻是幸福美满的，给了她安全感和精神的滋养。

在她的一生中，有两点常常被提到。其一是她传奇式的美貌。每个见到她的人无不为她光彩四射的美丽所心动。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曾回忆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天，当麦卡锡面带微笑来到晚会时，两三个男人都看呆了（Brightman, xiv）。麦卡锡是少数幸运的女子，她把男性意识中的妇德信条打得粉碎，却能逃之夭夭。这常常归结于她惊人的美丽。第二点是她的“淫荡”。思想犀利、辛辣的讽刺、性的坦诚使她被某些愤怒的男人赋以“我们的头牌荡妇知识分子”“现代美国荡妇”之类的蔑称。^①正如贝弗莉·格罗斯（Beverly Gross）所指出的：“‘荡妇’（bitch）这个词，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试图禁锢妇女行为和冲动的厌女症式的大棒。”（27）麦卡锡打破了女性身上的社会枷锁，难怪她被奉上这个称号了。

在20世纪80年代，麦卡锡已经70多岁了，这时，她开始收获与她“首席知识分子”身份相称的各种荣誉称号：1984年，她荣获国家文学奖章和麦克

①“现代美国荡妇”这个敌视性的称号是Paul Schlueter首先使用的；他声称她的作品“是现代美国荡妇的反映”（Gelderman, xi）；“我们的头牌荡妇知识分子”是Hilton Kramer在《美国的鸟类》书评（Bookworld, May 23, 1971）中奉送的称号（Gross, 30）。这些侮辱性的称号被如此经常地用于攻击麦卡锡，以至于贝弗莉·格罗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的首席婊子知识分子》进行反击。对于麦卡锡的敌视，亦参见Gelderman, xi-xiii。

杜威文学奖章；1988年，入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长。

玛丽·麦卡锡是一个多产作家。她一生共出版了22本书，包括小说、评论、传记、艺术史和政治报道等五个种类。她的政治报道包括五本关于越南战争的小册子：《进展如何》《越南》《河内》《麦地那》和《早晨的儿子们》（这五本小册子于1974年结集为《第十七度》），和《国家面具：水门事件》（1974）。前者记述了她在两个国家尚在战争状态时勇敢的北越之行，后者是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她的艺术史作品（游记作品）包括《威尼斯观察》（1956）和《佛罗伦萨的石头》（1959）。两部作品成为了关于这两座城市的经典散文。麦卡锡的文学评论文如其人，犀利而尖刻。她对一些文坛巨擘，如田纳西·威廉姆斯、阿瑟·米勒、J. D. 塞林格等的批评也招致了他们的追随者的愤怒反击。在文学批评上，她的文章如《穿制服的艺术家》《解决上校的哈希》常被引用。文中她公开表达了对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象征物的不满。

随着时间涤荡去她身边的“喧嚣和疯狂”，麦卡锡终将以传记作家和小说家名留青史。麦卡锡的自传名声显赫，不亚于她的小说。她有三部自传性作品：《追忆天主教少女时光》（1957）、《我的成长》（1987）和《知识回忆录：纽约纪事 1936—1938》（1992，逝世后出版）。《追忆天主教少女时光》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1912到1928年间，她从小女孩成长为一个少女的经历：在西雅图度过快乐的孩提时光，遭受“迈耶斯叔叔”噩梦般的虐待，被慈爱的姥爷所拯救，在修道院里失去信仰，在高中和男生鬼混。这些经历不仅仅是从纯真走向世故，也是一种感情上的探险和成熟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追忆天主教少女时光》像一个白雪公主式的故事。只是白雪公主为继母所虐待，而麦卡锡是被一个男人所虐待；白雪公主为王子所拯救，而麦卡锡为姥爷所拯救。《我的成长》则记录了自1925年她13岁时“产生了独立的思想”，到1933年她21岁时从瓦萨学院毕业，陷入到一场与哈罗德·约翰斯拉德的无爱的婚姻，这八年的青春岁月。尽管和《追忆天主教少女时光》在时间上部分重合，但它仍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这部传记很大程度上记录的是她的研究兴趣和思想成长。在这部书里，她对读书的爱好和她如饥似渴的阅读习惯被着重提及。她最后的自传《知识回忆录》则记录了1936—1938年间她在纽约文艺界的经历。那时，她是一个刚离了婚、迷失了方向的年轻妇女。尽管书名如此，但这部最后的自传故事却和她的知识生活毫无关系。总体说来，这部自传是关于她的性探险的一本日志。《知识回忆录》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思考她为什么嫁给了埃德蒙·威尔逊，“一个怪物……一个牛头怪。”（99-100）她把这次婚姻归结于她曾和他发生过性关系这样一个毫无说服力的答案。

作为小说家，玛丽·麦卡锡共创作了《她结交的朋友们》（1942）、《绿洲》

(1949)、《学术林》(1952)、《着了魔的人》(1955)、《少女群像》(1963)、《美国的鸟类》(1971)、《食人族与传教士》(1979)等七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冷眼旁观》(1950)。这些小说题材多样、主题深刻。《绿洲》描述了一群自由知识分子——编辑、教师、牧师、诗人、记者等——在纽约郊区购买了一座废弃的酒店和周围的土地进行群居实验的故事。然而,他们逐渐发现,他们的乌托邦其实与他们所逃离的社会并无二致。两个派别,“现实主义者”和“纯洁主义者”把整个社区会议变成了政治争斗的前线。他们追求普遍幸福的理想主义社区也和狭隘而自私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出一辙。

《学术林》被一些批评家归类为“学界小说”——一种关于大学校园里的学术生活的小说。^①故事发生在乔斯林学院——一个宣称以进步主义和学术自由为图腾的人文学院。在故事开始,亨利·马尔卡希,一位英语教授,刚刚接到校长的解雇信。尽管有博士学位和作品出版,这位教授实际上是一个平庸之辈,是一位反英雄形象。他利用了学院在麦卡锡主义驱巫时代公开宣扬的自由主义理念,故意传播流言说因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他将不被续聘。这样,他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位学院的学术自由正被破坏的受害者,激起了全体教师的义愤。校长无可选择,只好续聘了他。这里,自由主义的浅薄暴露无遗。

《美国的鸟类》和《食人族和传教士》均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他们表明麦卡锡越来越远离社会现实。《美国的鸟类》可以视为女性创作的男性成长小说,追溯了一个年轻人走向世故和成熟的过程。19岁的男青年彼得·列维(Peter Levi)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学习哲学,试图按照康德的哲学伦理来安排生活的一切。他坚持着康德的两个信条:“他者即目的”(4)、“只按照你希望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131)。在美国,令他痛苦万分的是,他发现,鸟儿们和鸟儿们所代表的他所钟爱的旧的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了躲避兵役,他去欧洲留学。在欧洲,他发现康德的伦理学更是与现实格格不入、荒唐可笑。于是,他逃避到了对异国鸟儿的追寻中,象征着他向大自然逃避的倾向。

在《食人族和传教士》中,麦卡锡进一步逃离了美国社会现实,陷入了对抽象理念的沉思。一架从法国飞往德黑兰的客机被劫持,降落在荷兰机场。机上载有一群前往伊朗调查国王沙阿暴政的自由主义政客,和一群前往伊朗收购艺术品的百万富翁、艺术收藏家。恐怖主义者的头领杰罗恩,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艺术爱好者和托洛茨基同情者;他命令机上的收藏家们交出自己最好的绘画

①《学术林》被许多批评家归于“学界小说”。Randall Jarrell的 *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 (1952) 和 Kingsley Amis 的 *Lucky Jim* (1953) 被视为学界小说中的两座里程碑 (Tierney, 163)。

藏品来换取活命。在这部小说里，恐怖分子和人质的人格刻画入微、栩栩如生。小说把艺术品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变成了赌注。尽管情节引人入胜，但小说总体已显得荒诞不经、远离现实。小说中，充满理想主义和温情的恐怖分子与人质间和谐的人际关系更是匪夷所思。

在她的短篇小说集《冷眼旁观》(1950)里，共有四篇虚构性的故事，和三篇自传(三篇自传七年后都被收入《追忆天主教少女时光》)。在这四篇短篇小说中，《杂草》(“The Weeds”)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女人陷入了一场令她感到无限压抑的无爱婚姻，然而，她却没有勇气离开丈夫，走出牢笼。多年的依赖、顺从早已侵蚀了她独立生活的自信。当她终于鼓足勇气逃离丈夫，来到城镇的旅馆住下后，无限的自由却使她心慌意乱、无所适从。几天后，当她终于平静下来，下定决心独自一人去闯荡世界时，她的丈夫出现了。她瞬间像气球一样泄了气，乖乖地跟随丈夫回了家。习惯是她的天罚，懦弱使她深陷性压迫的深渊而不可自拔。

在麦卡锡的小说中，只有《她所结交的朋友们》(1942)、《着了魔的人》(1955)和《少女群像》(1963)三部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她结交的朋友们》刻画了一位少女在纽约这座荒原般的大都市追寻自我的曲折经历，《着了魔的人》描述了一个女性艺术家的痛苦成长，而《少女群像》记录了九位年轻姑娘的人生经历，她们的梦想、失落和挫败。这三部小说可以归类为女性成长小说，是本书研究的核心。

II. 玛丽·麦卡锡研究现状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玛丽·麦卡锡传奇式的人生似乎比她的小说要有趣得多——尽管她的小说有时也幽默而诙谐，但通常抽象而忧郁。人们更喜欢读她的自传《追忆天主教少女时光》，而不是她的经典之作《少女群像》。在玛丽·麦卡锡研究中，学者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她生平轶事和历史考证上。迄今为止，麦卡锡研究中，已经有四本传记作品面世。

多丽丝·格伦巴赫(Doris Grumbach)的传记《她结交过的朋友们》(1967)是麦卡锡研究中的第一部传记。尽管包含麦卡锡的许多奇闻轶事和一手采访资料，这本“钦定版”传记观点狭隘而偏颇。在麦卡锡和威尔逊施压之下，许多信息被删除了。^①即使如此，她笔下的麦卡锡也绝无被奉承之感。在她眼里，“麦

^① 这本传记经过了麦卡锡和威尔逊的严格审查。涉及他们婚姻的大部分内容都被改写或删减。参 Kiernan, 566-572。

卡锡是美国文人中脾气最坏的女人”，“一个你绝对不会愿意和她在窄巷里迎面相遇的人”，“一个会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脾气火爆的讽刺专家”（Grumbach, 15）。卡罗尔·格尔德曼（Carol Gelderman）的传记《玛丽·麦卡锡：生平纪事》（1988）以编年体的体例评述了麦卡锡从童年到少女时代的岁月。书中特别关注了她的文学成长和她在20世纪30—40年代与《党派评论》文学圈子的密切关系。卡罗尔·布莱特曼（Carol Brightman）的传记《危险的写作：玛丽·麦卡锡和她的世界》（1992）有了不少新的发现，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麦卡锡的政治激情上颇有建树。2000年，弗朗西斯·基尔南（Frances Kiernan）发表了《真实的玛丽：玛丽·麦卡锡的生活》。这本书是基于麦卡锡的第一手资料编著的，提供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在这几部传记里，几乎可以说，麦卡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不厌其详地审视过了。

然而，和麦卡锡的传记大行其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她的小说，却很少有批评专著发表。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的绯闻和经历被许多学者研究，但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她却被严重地忽视了。2004年，布伦达·墨菲（Brenda Murphy）提出疑问说：“是什么造就了这种怪现象呢？我们的这位文学家现在已是四部大部头热销传记的主角，但迄今为止，却对她只有两部批评专著呢？”（“Preface”，1）。事实上，严肃的麦卡锡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开始。

我们可以大致把麦卡锡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她在20世纪30年代以剧评家的身份登台亮相到60年代中期；这时麦卡锡已经成为美国文艺界的活跃分子。尽管已经发表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一部很畅销的自传，但在文学界，她仍备受轻视，不过是一位目光犀利而又伶牙俐齿的文学批评家，一个“无耻的泼妇”。至多，她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畅销书作者，一个记录日常琐事的女作家而已。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个阶段见证了女性解放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崛起和衰落。在这个阶段，玛丽·麦卡锡作为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的形象，被进一步固化了。事实上，她被女性主义者轻蔑地称为“男人的女人”（Brightman, “Characters”，208）。这个称号，她算不上很冤枉：她从来对女性主义充满了傲慢，称之“为害女性”“顾影自怜”（Brightman, “Mary”，244）。而她嘲讽西蒙娜·德·波伏娃为“萨特的女人”更是激怒了大量的女性主义者。她为美国文坛所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去国远行——在20世纪60—70年代，她和第四任丈夫詹姆斯·韦斯特栖居巴黎。在这个阶段，玛丽·麦卡锡研究主要是考据式的、传记式的。玛丽·麦卡锡是一个知名的知识分子和激情四溢的政治活动家的形象。这个阶段见证了《她结交过的朋友们》（1967）、《玛丽·麦卡锡：她的生活》（1988）、《危险的写作：玛丽·麦卡锡和她的世界》（1992）三本传记的发表。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可视为麦卡锡研究

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再次见证了麦卡锡传记的鸿篇巨制：近 850 页的《真实的玛丽：玛丽·麦卡锡的生活》（2000）。也只是在这个阶段，可以说，严肃的麦卡锡研究才真正开始。1993 年，一个玛丽·麦卡锡学术会议在巴德学院召开。1999 年，在麦卡锡逝世 10 年之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年会开设了玛丽·麦卡锡专题讨论会。2004 年，《文学阐释理论》（*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杂志社发表了玛丽·麦卡锡专刊。玛丽·麦卡锡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玛丽·麦卡锡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自传作家。她的自传的声誉甚至大大超过了她的小说。因此，批评家们热衷于研究她的自传，这毫不奇怪。《追忆天主教少女时光》（1957）是她最著名的自传作品。在《我不对你说谎：玛丽·麦卡锡的〈追忆天主教少女时光〉和权威的虚构》一文中，芭芭拉·罗斯（Barbara Rose）指出了女性自传创作的艰辛，探讨了麦卡锡对自传这一男性体裁的颠覆。传统上，自传是一种男性体裁，讲述主人公个人主义式的真实经历。然而，在她的《追忆天主教少女时光》中，麦卡锡不仅模糊了事实和虚构的界限，而且用女性经历的日常琐事替代了男性自传的宏大叙事。在女性自传创作中，麦卡锡颠覆了自传文化自我赋权的真实和权威。批评家们在她的自传里苦苦探索的主题还有女性成长、追求真理、性的探险等等。

作为小说家，她身边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也许最响亮的声音来自于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她失败了！”尽管梅勒是在评论《少女群像》，但发此感叹时，他已经把她直到 1963 年来的所有小说置于视野。与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批评《少女群像》是“一位无聊的女人的小说”相呼应，梅勒指责说《少女群像》作为一部“群体小说”，缺少历史维度，没有把“当今或近十年来最广大的社会现实”融入小说；而且，“她的人物既无意参与正在形成的社会历史事件，也不会成为强烈感情的受害者。”因此，《少女群像》平庸、无趣，“充满着物质”，不过是“一本女人写的书”而已。梅勒由此高声宣称：她失败了！——“她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她失败了，由于虚荣：她多年来名声在外，其实盛名难副……；她失败了，由于内心深处的懦弱——像每一个出生于天主教之家的人一样，她担心放出魔鬼；她失败了，由于对于她塑造的人物的蔑视。”（“Case”）梅勒称呼麦卡锡的故事主人公是“尿出来的人物”。他指责说：这些人物都游离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事件之外，也没有哪个女孩激情四射、妙趣横生，更没有哪个女孩勇于走出自己所处的阶级，向上或向下和人结婚，没有人迷人而放荡，没有人悲剧性地深陷爱情，也没有人有魄力、有勇气打碎自己性格的牢笼——她们甚至没有看到任何如此而为的必要性。

梅勒的批评深刻而又影响深远，以至于以后的麦卡锡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了

一个选边站队的游戏。在他的《三十年代，公与私：重新评价玛丽·麦卡锡的〈少女群像〉》（2004）中，布伦达·墨菲（Brenda Murphy）针锋相对地反驳了梅勒所谓《少女群像》脱离社会历史的指责；她声称，以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为主题，玛丽·麦卡锡是在发出断言：“她们是美国30年代活的编年史，是新政之进步主义理念的失败：它甚至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群最优秀的美国女性。”（“Thirties”，100）在她看来，“私”超越了它的局限性，涵盖了“公”之社会全景；《少女群像》真实地捕捉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精神。

对于麦卡锡的人物塑造的批评也常常是梅勒观点的继续。在《我所有的思维习惯：玛丽·麦卡锡小说中的表演和身份》（2002）一文中，凯莉·马什（Kelly A. Marsh）认为麦卡锡的小说人物都是类型化的：“麦卡锡独特的观察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她把别人看成类型这种能力上。”（304）愿意与否，她们都只不过是某种社会角色的表演者而已。所有的人物都明白：“自我就是表现，是类型而已。”（306）她的人物角色努力逃离类型化，但都失败了。这表现了麦卡锡的悲观主义观点：人永远不能完全逃离自己所属的类型，因为“一个人所有的行为都只不过是重复，表演那些在你出生前就已存在的剧目”（305）。因此，人没有独立自我和自由意志可言，人生是不变而乏味的。

麦卡锡是一位讽刺作家；她总是把她的人物形象类型化、漫画化，以暴露她们的弱点和可笑——这也许是对麦卡锡人物塑造上最严厉的攻击了。然而，相似的攻击不断涌现。正如卡罗尔·格尔德曼所观察的那样，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麦卡锡一直在吸引着评论家们的怒火。在约翰·奥尔德里奇（John Aldridge）眼中，她尖声刺耳，她的小说充满了“淫荡”，保罗·施吕特（Paul Schlueter）称她“现代美国荡妇”，而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批评她尖酸刻薄、恃才傲物（xi）。在《恶意之闪光》（1993）一文中，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声称麦卡锡的人物本质上都是喜剧性角色：“恶意、讽刺、机智式的嘲笑是她小说的精髓。”（23）在《另一个麦卡锡主义》（2002）中朱迪思·舒利威茨（Judith Shulevitz）把麦卡锡描述为一个目光敏锐却心怀恶意、以揭露他人愚蠢为乐的讽刺专家。^①在对麦卡锡大批判的喧嚣中，像“刀子、匕首、弹簧刀，冷酷、无情、精明、理智、尖刻、刻薄、尖酸”等词语被一再使用（Gelderman，xi）。

在这喧嚣的批评声中，一些批评家也为她挺身而出。在《我们的首席婊子知识分子》一文中，贝弗莉·格罗斯（Beverly Gross）指出，所有对她的非难

① 在这篇文章中，玛丽·麦卡锡被比作以迫害共产主义者为乐的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

和谩骂“都不过反证了她无与伦比的权威、勇气和沉着……她在很小的年纪已经产生了杀死她大脑里的‘家里的天使’的勇气”（32-33）。

所有的非难都绝非偶然，正如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杀死家里的天使：女作家的自主性》（1972）中所说：“绝大多数反抗女性公式化形象的女作家遭受过比麦卡锡多得多的谩骂。勃朗特姐妹曾被称为‘她们性别中的流放者’；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被人称为‘粗俗’；凯特·肖邦的《觉醒》被视为道德毒药而被禁；西蒙娜·德·波伏娃被人诅咒为性冷淡；凯特·米利特被人骂作性变态者。”（347）总之，做女作家就是要受侮辱的。然而，麦卡锡毫无畏惧的战斗风格无疑招致了更多的谩骂和攻击。

一种对她更温和的批评常常提到她对“赤裸裸的真理”的追求，她“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癖好。为此，她不惜冒犯他人，不惜牺牲女性尊严，甚至更多的时候不惜伤害自己的声誉。在《粉色裤子和子宫帽：玛丽·麦卡锡的尴尬美学》（2004）一文中，杰米·克莱兰（Jaime Cleland）说“她时常孤注一掷地追求着一条唯一的真相，这给她大部分的作品染上了颜色，也提供了题材和视角”（33）。她甚至把麦卡锡习惯性让人尴尬的倾向称为她的美学原则。

麦卡锡饱受攻击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在性方面的坦率和夸张。和她们的创造者一样，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都不是传统妇德的信徒。在麦卡锡批评中，一个声音不断浮现：她暴露了女性的隐私。《少女群像》因为它坦率而详细地描述了多蒂破处和安放子宫帽的过程而声名远扬。该书商业成功的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它的厚颜与大胆。在《在现代美国小说中插入子宫帽——玛丽·麦卡锡，菲利普·罗斯，和避孕文学》（2003）一文中，贝丝·韦德迈尔·卡波（Beth Widmaier Capo）幽默地打趣麦卡锡，说她在美国现代小说中放置了一个子宫帽。^①卡波审视了子宫帽在求爱、热恋和婚姻中的角色，以及避孕工具如何改变了男女之间的权力动态格局。卡波写到：“通过触及避孕技术在现代异性恋中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那些文本使女性同时成为生育控制的主体和客体，突出而又淡化了女人作为子宫和性动物的角色。”（112）在她看来，子宫帽在解放女性的同时，也在压迫着女性。在《女性秘密和小说：回忆玛丽·麦卡锡的〈少女群像〉》（2001）中，南希·K. 米勒（Nancy K. Miller）也关注了麦卡锡把子宫帽引入小说的事实。她指出，把隐私置于公众目光之下，麦卡锡终将“重塑公、私之分野，重新定义国民体统”，并将“赋予女性历史以声音”（189）。麦卡锡扩展了女性空间，赋予了这一特定女性经历以声音。在传记《玛丽·麦卡锡》（1966）一书，芭芭拉·麦肯齐（Barbara McKenzie）也指出：在麦卡锡的小说

① 女性避孕工具子宫帽的引入后来为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再见，哥伦布》（1969）中所效仿。